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7 月 2 日)

1、《外交政策》：拜登需要国际组织战略

6月29日,《外交政策》刊登了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顾问理查德·戈德伯格(Richard Goldberg)撰写的题为《拜登需要国际组织战略》一文。文章认为美国两党均缺乏在国际组织维护美国利益的全面战略,使得多边组织为敌对国家所用。作者指出,最近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世贸组织中影响力增强,开始塑造国际规范,操纵相关机构推进其“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在核与化学武器防扩散机制中保护叙利亚和伊朗;中俄在安理会中阻碍多边行动都给美国带来巨大挑战。退出国际组织不能应对挑战,反而会给敌对国家更多机会,尤其是中国在这些组织中获得更大影响力(如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尽管拜登选择与国际组织接触,但美国应更积极地推进其改革,世界卫生组织、世贸组织、近东救济工程处、人权理事会等都应成为美国积极行动的平台。无论是与盟国合作还是单独进行斗争,美国都必须主动、持续地促进国际组织的改革,以恢复其领导的国际秩序来推进美国本国利益。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6/29/biden-china-russia-interna>

tional-organizations-strategy-czar-united-nations-multilateral-agencies-control/

撰稿人：王欣然

2、《德州国家安全评论》：AI 安全竞争并非军备竞赛

6月29日,《德州国家安全评论》(*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发布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兼研究主任保罗·斯查瑞(Paul Scharre)撰写的文章《揭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理论的真相》。作者指出,各国在人工智能(AI)技术研发和行业应用上竞争激烈,各国军队也积极引入AI提高军事能力。尽管当前AI竞争更多是技术竞赛,军事AI竞争规模远未达到军备竞赛水平,但AI军事应用创新改变了战争性质,使国家安全环境恶化。一方面,AI赋能军事应用,尤其实现快速自动化决策后,战争将节奏更快、更暴力和难以管控。此外,安全竞争的另一项动态风险来自国家急于获得对对手的领先优势,在测试、评估、验证和确认(test, evaluate, verify, and validate, TEVV)过程中走捷径,在系统未经充分测试时进行实战部署。这种倾向违背了军方对复杂、危险和对抗性战场环境中追求稳健性的传统,可能导致事故并破坏国际稳定。最后,作者提出管控AI安全竞争有害风险的行动建议:各国应合理投资用于TEVV的内部程序,确保引入军用领域的系统强大且安全;采取具体措施避免因测试疏忽将人类决策权让与机器;探索降低风险的合作措施,通过联合声明、行为准则和建立信心措施等方式减少AI伤害、促使各国负责

任地利用 AI。

<https://tnsr.org/2021/06/debunking-the-ai-arms-race-theory/>

撰稿人：崔元睿

3、战争困境：美国海军的“战略破产”

6月30日，美国“战争困境”（War on the Rocks）杂志网站发布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国防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尔蒂（Chris Dougherty）撰写的文章《渐进而后突然：解释海军的战略破产》。文章称，美国海军正处于战略破产（strategic bankruptcy）的边缘，其舰队规模不足以安全地支持全球部署的日常需求和紧急增援的任务，也没有足够能力应对日益现代化、锐意进取的中国海军的挑战。2022财年国防预算首次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尽管有强烈需求通过“大规模紧急变革”应对挑战，但目前为止的的预算申请只有适度规模的变革。作者分析，这首先由于军政界对中国构成的风险缺乏共识，分析人士的关注点接近、中、远期分布在南海等低烈度冲突、未来五到十年的常规战争可能性和中国军事现代化加速带来的威胁因素。其次，规划者对海军力量建设未来缺乏共同愿景。对于风险认知的差异决定了海军不同群体对军力建设愿景持不同看法。主流意见多关切近期威胁，因此海军主推传统的全球力量分布和前沿部署的战略规划，但国防部更担心中期与中国发生对抗，应加强水面防御能力，技术研发专家和净评估办公室等远景规划部门则希望投资于长期技术竞争；这些愿景之间的竞争体现在2020年

提出的“30年造船计划”过于乐观和不切实际。最后，现有的预算结构和财政能力难以满足舰艇现代化、维持规模优势和力量结构重组的复杂需求，激烈变革的选择空间有限。作者总结，为防止终致暴力冲突的战略破产，解决重整战备和投资技术研发的冲突，下一个国防规划应明确提供对中国挑战的评估，并为未来的海军提供一个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共识性的远景规划。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6/gradually-and-then-suddenly-explaining-the-navys-strategic-bankruptcy/>

撰稿人：崔元睿

4、《南华早报》发文分析建立“贸易版北约”的可能性

6月28日，《南华早报》发布驻欧洲记者巴尔·伯明翰（Finbarr Bermingham）和政治经济学记者周茜茜（Cissy Zhou）的文章《英美对华鹰派呼吁建立针对北京的“贸易版北约”》。文章指出，面对中国愈加强硬的对外政策，一些英国鹰派政客和美国行业游说团体正在呼吁西方同盟建立一个“贸易版北约”，即“民主国家联盟条约组织”（Dato），以对抗中国将贸易政策“武器化”的行为。根据该组织拟议中的制度框架，在中国对 Dato 成员国采取贸易上的强制措施以迫使其在其他问题上服从中国意志时，Dato 将通过对等的报复行动来保护受到攻击的成员国。此外，该组织将接纳所有“民主国家”，但如果某一成员国拒绝在 Dato 做出报复决定后采取行动，它就将失去成员资格。文章指出，虽然西方国家对与中国贸

易是否互惠互利这一问题的看法日益消极化，但其内部难以就采取实际行动达成一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行业利益起到很大影响力，而中国对一国某行业产品的进口制裁往往会使得另一国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获益，从而造成对华一致行动的难产。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38948/british-us-china-hawks-call-nato-trade-against-beijing>

撰稿人：许卓凡

5、《国会山报》：美国须推动跨大西洋合作以实施“一带一路”替代方案

7月1日，《国会山报》发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能源项目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克·施罗德（Patrick Schröder）、美欧项目高级研究员玛丽安·施奈德·佩辛格（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的文章《为了“重建美好世界”，美国必须跨越大西洋》。文章指出，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近期举办的峰会中联合发起了“重建美好世界：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B3W），该倡议将成为“一带一路”的有效替代品。然而，若要使 B3W 真正成为一个有关“清洁和绿色增长的倡议”，美国应与其跨大西洋伙伴合作推动供应链弹性和可持续性的深入整合。首先，半导体和先进电池是影响未来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美国应与盟国及来自工业和非营利部门的利益攸关方加强合作，以提高关键产品供应链弹性，美欧近期在民用飞机等贸易领域争端的解决为双方开

展上述合作提供了契机。其次，循环经济能够在增强供应链弹性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还能够在绿色技术、可持续产品、新材料商业化等领域创造更多商机和就业岗位，美国应通过参与欧盟发起的“全球循环经济与资源效率联盟”(GACERE)、与合作伙伴一同制定关键材料可持续性新标准等方式推动跨大西洋循环经济合作。未来，双方应致力于扩大供应链合作清单，使其涵盖塑料、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等更多产品，并发展有利于关键矿物可持续生产加工的新投资模式，以期实现清洁、绿色、公平的人类发展。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38948/british-us-china-hawks-call-nato-trade-against-beijing>

撰稿人：许卓凡

6、卡耐基欧洲中心：拜登欧洲之行的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6月30日，卡耐基欧洲中心网站刊登其高级研究员皮埃尔·维蒙特（Pierre Vimont）的文章《拜登欧洲之行的遗留问题》。拜登欧洲之行目标清晰，旨在重新恢复跨大西洋关系，为双方关系注入战略定力，共谋应对长期全球挑战之道，强调美欧要与极权主义作斗争、重申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欧洲对拜登访欧抱有较高期待，拜登团队也以其专业性和高效性给欧洲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双方对会议预期的客观差距、对待中国问题的具体方式存在明显分歧，美欧也未能就如何恢复和扩大西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达成全面的计划。具体而言，美国侧重强调双方关系中的指导性原则，修

复跨大西洋关系，重申西方对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的承诺，并不急于深入讨论具体议题，而欧洲却希望在贸易分歧、气候变化等争议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作者指出，华盛顿需澄清对欧洲利益关切的态度，否则跨大西洋关系将受损。作者强调，双方在如何应对中国、气候变化、贸易、科技等问题领域存在明显政策分歧，需加以澄清。此外，本次拜登访欧未能就如何维持和扩大西方影响力制定全面的计划。这项计划应涵盖重振自身民主体系、调整外交、安全政策、提倡多边外交等多个方面，对内重振自由民主，对外援助伙伴国家。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1/06/30/unanswered-questions-from-biden-s-european-tour-pub-84869>

撰稿人：任怡静

7、CSIS：重返 CPTPP，美国或需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进行必要妥协

6月28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登非常驻高级顾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副秘书长乔安娜·谢尔顿（Joanna Shelton）的文章《CPTPP 与知识产权保护》。作者主张美国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应对全球竞争，指出知识产权保护（IPR）将是美国重返 CPTPP 面临的一个具有潜在争议领域。在此前的 TPP 谈判过程中，美国大力推动将自身主导的高标准 IPR 相关条款写入谈判协议，遭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等志同道合国家的广泛抵制，并在美国退出 TPP 后将有关

条款移出协议文本或暂停执行。这些条款仅涉及药品及版权持有者相关内容。对知识产权持有者的保护程度较高，可使生产者从中获取大量经济收益，但过高将对公众健康、互联网个人隐私、知识的获取及产业创新产生消极影响。作者强调，与美国采取的高度规范的做法形成对比，中国参与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采取了更为普遍的做法，充分考虑各成员国发展水平、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与执法目标有所不同的状况，更具吸引力。作者主张，美国在坚持保护发明和创新的同时，可进行必要妥协，接受不完美的协议以推动 CPTPP 协议的达成，有助于美国在全球竞争、尤其是与中国竞争时实现自身利益。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ptpp-and-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protection>

撰稿人：任怡静

8、《华尔街日报》：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中国判断错了吗？

6月2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其专栏作家威廉·麦古恩（William H. Frey）的文章《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中国判断错了吗？》。文章认为，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曾预言中国的经济自由将导致其政治转型，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并未实现政治自由并不能证明弗里德曼的错误。事实上，他也曾强调过没有政治自由，也可能产生自由经济。而中国之所以可以在资本全球化时免受外国压力，则是因为其庞大的人口带来的市场规模。举例而言，澳大利亚以安全为由禁止了华

为参与其 5G 建设，并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这导致了中国全面抵制澳大利亚产品，使澳大利亚这一出口导向型国家经济受损。因此，在华经商的外国人面临中方的不满时会迅速道歉以保护其中国市场。然而中国面临着老龄化社会、性别比例失调和缺乏可兑换货币等问题。如果拜登想要在对华经济竞争中获胜，比起加强联邦作用从而建设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美国更应该像弗里德曼所言，打造更为自由灵活的私营部门。

<https://www.wsj.com/articles/was-milton-friedman-wrong-about-china-11624918231>

撰稿人：张昭璞

撰稿人：崔元睿、许卓凡、王欣然、任怡静、张昭璞

审稿人：王静姝、周武华